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〇期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2b)

【史海钩沉】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	迟泽厚
【往事如烟】	北大“文革”二三事	郑克中
【难忘岁月】	文革纪实——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金 渝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

• 迟泽厚 •

〔《往事》编者的话：据说，毛主席是无私和无畏的，他是“公”的化身。他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文革中，盛行“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的最高标准和境界就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因为他是人民大救星，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云云。

在民间，农民养头猪、种点自留地的“私”都要破，因为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但是为毛主席修“行宫”，却是属于“公”，因为这是为了毛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

自古打天下是为了坐天下；只有“造反有理”，才有享受有理，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老百姓认为，为了毛主席怎么做也不为过；而毛本人也说过：“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据《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当然，毛所追求的更高“享受”应是权力和权斗的过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认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他看到“走资派”、“当权派”们（他认为自己被架空）把北京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时候，便毅然走遍祖国大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燎原星火。正如以前的“农村包围城市”，如今要“外地包围北京”。不同的是，以前造的是当权派蒋介石的反，而今造的是自己臣子的反。时代不同了，即便是“重

返井冈山”，也不宜在山沟里，而要在风光好住得舒适的“高级宾馆”里，以便“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待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很快分裂了。“九一三”一声爆响，盖行宫的“光荣”变成了配合林彪“另立中央”的罪过，直到毛和周出来说话，才躲过一劫。但是，在批林批孔中和四人帮倒台后，旧案一再重提，参与其事者被处理，上边当初的主事者至今保持沉默。

应该说，盖房子在毛不过是小事一桩。4 0 0 0 万元在当年虽然不是小数字（人力、土地、全国各省市的无偿支持，还都不计算在成本之内），他未必多在意——甚至未必过问。比起历代帝王，毛的起居也确有俭朴的一面。问题是，当时的历史是要化私产为公产，灭私权以铸公权，权力是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有权就有一切。有限的特权腐败是建立在普遍的贫困基础之上的，国力民力有限，腐败自然也有限。

如今，往日的行宫在众多新建的现代化的豪华宾馆和别墅群中，显得无足轻重。与之相伴的，是毛氏的有限特权腐败已经被官僚的等级腐败所代替。特权腐败在等级腐败面前，特权阶层在权贵资本面前都已是小巫见大巫了。化公产为私产，借公权以谋私权，权钱交易，公权力的普遍腐败和腐败的公开化，即腐败在权力的保障下，达到制度化、法律化，正是当今等级腐败的特点。只是，与当年相比，它少了一份从容与自信，显得贪婪而惶急，因为，它分明听到了历史的脚步。)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 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常来广州。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1号楼，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从1962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回到广州，丁盛和刘兴元立即按汪东兴的要求亲赴白云山区勘察，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围着白云山主峰转了半天，但未发现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广州军区领导人积极筹划为毛泽东修建新住所之时，突然发生了江青大闹小岛事件。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三亚）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1号楼。以前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因而军区和省委领导人都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岂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今非昔比，她不仅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中央首长，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进入1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10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10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军区和省委领导不敢再有丝毫马虎，通知对岸工厂立即停工，又责成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迅速组织人力，到小岛东西两侧江面，拦截各种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小岛江面。

倘若谁不懂什么叫做淫威，谁不了解当年江青是何等威风，那么，这可算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

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4月11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元帅府”要维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间江青住在这里时，嫌房子门太多，风大；嫌电影放映机没有机房，放电影时机器好像在她头上响，让她头痛；嫌她随员住的房子离她太远，她呼叫不便；还嫌“元帅府”没有好车，她的车是用专机从北京运来的。听说江青对“元帅府”的接待工作有这样多意见，广州军区领导哪敢怠慢，赶紧叫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带上一名建筑工程师，赶赴榆林，同海南军区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元帅府”的维修、改建问题；又把省革委会最好的一台银灰色“奔驰280”轿车也调给“元帅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地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 飞武昌杭州“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 任务加码选定磨刀坑水库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1万平方米，5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个来月，谈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4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又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库水面约1平方公

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1.5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二次进京。他们带去了磨刀坑水库一带的地形图和其他有关资料。像上次一样，还是先由毛维忠听取汇报。

13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汪东兴要求军区尽快呈报设计图纸，他要亲自审查毛泽东住房的图纸；周恩来住房的图纸则交由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审查。

王庆林、邹合典回广州向军区领导汇报了汪东兴的指示，军区领导和机关又是一轮紧张的运作。在具体研究4组房子的定位问题时，军区领导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积很大，再考虑到将来的管理问题，何不把4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库来？

5月26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第三次进京。他俩不仅带去了4组房子的分布图、设计图，还带去了低空拍摄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库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览无遗。

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

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

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

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王庆林、邹合典竖起耳朵听，飞快地记录，唯恐有点滴遗漏。

讲到最后，汪东兴忽然又给王庆林、邹合典来了个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库这4组房子大体就这样了。那么，原来你们选的磨刀坑那里怎么办呢？你们回去向军区首长讲一下：那里还是利用起来，仿照磨刀坑水库第一组房子的模式，在那里给主席再修一组。那个地方也有优点：隐蔽、清静、朝向好。这样，一共修建5组房子。还有，省委小岛1号和鸡颈坑的房子，你们也要改建好。将来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库或磨刀坑，办公可以到小岛或鸡颈坑，让主席活动一下。”汪东兴还给这种活动方式起了个名字：“坐车被动运动”。

就这样，一番轻松的谈话给广州军区下达了一项很不轻松的任务。

接着，汪东兴又讲了一句让王庆林和邹合典头大的话：“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

汪东兴也不是什么都不管，王庆林和邹合典上次来汇报时，他答应给军区解决30辆轿车，国产“红旗”和苏联“吉姆”各半；还给解决两台大电影放映机，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各放一台。

◇ 磨刀坑水库改称南湖

接见将要结束时，汪东兴又讲了新房建成后的管理机构问题。他说：“机构的名称，就按你们的意见，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库以后就改称南湖，磨刀坑改称松园。招待所把这两个地方统管起来。”

为磨刀坑水库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刘如和王庆林的建议。一次在现地研究施工计划，不知是谁先提出，把毛泽东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总觉得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凑了一个意见：武昌有东湖，杭州有西湖，广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库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称松园。他们把意见报给丁盛，丁盛觉得有理，同意将意见上报。现在汪东兴一锤定音。

从此，在内部地图上开始以南湖地名取代磨刀坑水库，以后民用地图也逐渐改称。斗转星移，那里的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接见结束时，汪东兴对王庆林和邹合典重申了四月间他在广州讲过的话：“请你们回去告诉丁司令员、刘政委，给主席盖的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主席国庆节一过就去广州。从现在到9月底还有4个月，你们务必抓紧！”稍停，他又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七·一’过后，我就让毛局长到广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积极筹划建房工程的同时，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经验，紧锣密鼓地研究了组建一个统管广州市军队和地方内部接待机构的问题。受命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参谋长刘如，经过与军区三大部和各有关业务部门多次研讨，建议将新机构定名为“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招待处”，下辖南湖、省委小岛、从化温泉等接待单位；还计划组建5个警卫连，编制总人数1300人。军区领导同意刘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报，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很快批复同意。

招待处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张小军被任命为招待处长，

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处政委。

◇ 光荣的政治任务

工程计划一经批准，就马上大干起来。如此庞大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队伍从哪里来？由于经费无保证，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紧迫，工程复杂，要求高，因而除经严格审查先雇请1800名技术工人外，不得不动用部队和部队的运输车辆以及大量工程机械。

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1970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的规划；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工程”。这两项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结束。如今，南湖、松园、小岛、鸡颈坑等处工程都沿用这一代号。

为了抢时间，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规，边设计边施工。

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千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军队修建高级宾馆毕竟经验不足，需请地方专家能人指导。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想起了广州市原副市长林西。林西过去分管市政建设颇有建树，对园林建筑尤有独到见解，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曾赴欧洲作过考察，在广东是公认的一位懂建筑工程的领导干部，颇受陶铸器重。“文化大革命”一来，他这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情调”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本人也进了“牛棚”。此时他正在广州市革委会从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施工办公室给丁盛、刘兴元写报告，建议请林西为顾问，丁、刘照准，批示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办理。施工办公室的几位领导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车赶赴从化，把林西接来。这位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领导干部，全然没有一点市长的派头，同王庆林、邹合典等人一起，长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军队干部的鼓励下，他逐渐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顾虑，又拿出了他的绝活儿。同样的东西，现在服务对象变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了。他的意见受到施工负责人的重视。特别是在环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设置方面，他力主尽可能保持自然美，尽量减少人工痕迹，这些意见都被采纳。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时，房后有株大松树，妨碍施工，很多人主张砍掉，王庆林反对。林西支持王庆林的意见，他说，修栋房子不过一年半载，这棵松树没有百八十年长不起来，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来。他叫人在树的四周挖了个浅池，池中铺上小石块，放进半池清水，树下立了块大石头，刻上“劲松”二字，众人无不喝彩，成为园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里堆了几个数十厘米高的平缓土包，园内空地遍植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与园林之美结合起来。1972年后，江青曾多次来这里居住。这位刁钻古怪最难伺候的女皇，居然对她住处的环境表示比较满意。曾同林西共事的军队干部对他无不叹服。

参加施工的部队官兵，把施工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冒着高温酷暑，昼夜苦干，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进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岛1号和鸡颈坑1号改建工程都已完成，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第一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国庆节即将到来，广州军区首长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进展情况，积极落实迎接毛泽东来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唯恐发生一点纰漏。

◇ 献忠工程变成甩不掉的烫山药

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集会，也没看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五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广州军区机关有些干部私下议论：如果要追溯历史，为什么只到第四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115师的前身是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三人论地位论威望，都在林彪、黄永胜之上。按照上述逻辑推论，岂不也可以说广州军区是最光荣、最可信赖的部队吗？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

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 丁盛的补救措施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叫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的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汪东兴对房子编号的意见，大概主要是着眼于安全警卫。至于说“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恐怕此话只适用于毛泽东和江青，周恩来和康生绝不会住进计划给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房子里去。

◇ 定心丸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地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做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

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 工程概貌

经过一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6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

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 毛泽东：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据称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在这次报告会上，江青还大骂林彪，并借机敲打广州军区。说林彪要暗害她，给她派了一个特务护士，天天给她下毒，她与林彪不共戴天，可是广州却有人为林彪修“行宫”——她指的显然是军区在林彪在老虎洞修的房子。其实，同南湖相比，老虎洞怕是连小巫也够不上。论规模，论气势，论用途，在广州只有南湖堪称当之无愧的“行宫”。

评论“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广州军区的政治形势，可以用4个字加以概括：有惊无险。

◇ 变局

但是，到了1974年春，风云突变！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贺南海前线军民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为名，亲笔给到职未及一月的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和排名在孔石泉、陈郁、王首道之后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写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诗人、一名记者为特使，乘飞机将信送来广州，同时还带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各500份。江青说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心连心的”，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与她一起投入这场斗争。

虽然这3名特使中的诗人和记者原是广州军区的一般干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资历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许世友特别指定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领导去机扬迎接，他与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东山宾馆）迎候。接过江青的信，叫人读了一遍，又与赵紫阳作了研究之后，许世友立即指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连夜将信用大字排印，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队，地方发到公社），并要求接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许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间说了不少感谢江青关怀之类的话。几天之后，许世友又与3位特使在海南相会，并再次宴请了他们。

1月29日，在军区礼堂召开驻广州陆海空军干部大会，宣读江青来信，军区领导表示要“不辜负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大会之后，许世友又主持召开军区党委会，谈感想，表决心，定部署。会议结束，党委书记立即遵照许世友的指示起草电报，感谢江青对广州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并报告对她指示的传达贯彻情况。

江青的来信使广州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迅速起动、升温。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当代“大儒”，其重点是“批孔”，即从批“孔老二”入手，联系当前路线斗争，打倒她的（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对立面，毛泽东也说过“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之类的话；但在广州，许世友则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联系斗争实际，重点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许世友说：“为什么林秃子要来广州另立中央？就因为当时党、政、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司令是他们的，政委是他们的，书记是他们的，（革委会）主任是他们的。广州陆海空军都被他们控制了，三军都有他们的人！”这次运动就是要把这些“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揪出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还是军区机关，对运动的表现却让许世友很不满意。为改变这种状况，许世友使出了杀手锏：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兼职政委的赵紫阳，让赵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宾馆接见广州原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向他们通报军区运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党，要求与造反派“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两派头头们，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当天便把炮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的大标语贴到军区机关四周。

其二，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军区机关参加运动。这一招很灵。这些人对黄、刘等人满腔怒火，无所畏惧，敢想敢说，很快成为带动运动的骨干力量，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进入5月份，运动的温度已经很高，对军区原领导成员“参与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闻”让人目瞪口呆。许世友信心十足，他频繁召开大小会议，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捅破这层窗户纸”，“打破沙锅问（问）到底”，彻底揭开广州军区被捂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盖子”，特别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谜底揭开。

◇ 许世友为南湖工程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处很快成为许世友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会上宣布：“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为林彪修的。那个招待处，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广州的接待处！”

此话一出，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党自然更是铁定无疑的了，但他们都已调离广州，于是曾参与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员江燮元、参谋长孙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几个负责组织施工者，本来就已定为运动中的“重点人”，现在又进一步“升级”，刘如、王庆林、张小军三人的日子尤其难过。三人在小会、大会说明情况，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说越说不清，主持运动的领导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中毒太深”，没有“转变立场”，必须“击一猛掌”。而更让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们焦头烂额之时，却又后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处政工科科长的干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来揭发：军区原主要领导早已向招待处领导“交底”，招待处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九一三”前招待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军区原主要领导如丧考妣，指示招待处领导在南湖修了两大一小共三个坟包，为林彪招魂，两个大坟包是给林彪、叶群修的，小坟包则是林小贼（立果）的；因为不敢公开在坟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劲松”两个大字，表示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赞颂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

被批斗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会为他们说话的。他们苦苦地盼着这一天，特别寄希望于汪东兴，只要汪主任出来说一句话，谁还敢拿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变成失望。

◇ 急刹车

大约上面也感到许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运动的发展。1974年7月29日，终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军区党委常委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批评在前一段运动中“随意宣

布刘兴元、丁盛等同志为死党、反革命，对其他同志也点名过多，势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纠正；并决定派韦国清来广州主持军区的运动。这份电报属绝对机密，只在军区党委常委中传阅。韦国清虽然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广西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过问军区日常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紧急赶赴广州，主持军区的政治运动，可见事情非同小可。这是对许世友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军区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揭发出来的那些引起轰动的材料，揭发者纷纷打了退堂鼓，承认自己撒了谎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却又记不得是谁说的了。

就这样，对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 南湖移交广东省委

广州军区机关对南湖工程的清查闹得热火朝天，其实此时的南湖已经不属军区，而改属中共广东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堪称毛泽东最具权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广州军区领导仅凭他的几次口头交代，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园）工程，并按照汪东兴的意图组建了庞大的党政军统一的内部接待机构。不曾料想，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还是同一个汪东兴，却又对广东的内部接待工作来了个大改变，他通知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今后对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南湖招待所移交广东省委。于是，整个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园林、全部建筑、各种家具陈设、几十台高级轿车，一概无偿地移交给广东省委；招待所的军队干部集体转业。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锅还得由广州军区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南湖工程成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机关对这项工程的来历所知更少，因而他们所谓的揭发批判就更多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更加不着边际。

1975年10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后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领导有了明确态度，果然一段时间以内便没人再拿南湖问题做文章了。

◇ “揭批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上面认为“广州军区……问题比其他单位多”，是“重灾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还有刘兴元”，“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

有了上面的定调，许世友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任务还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揭批林彪一伙，就是揭批“四人帮”。他还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眼看就要揭开军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了，但由于“四人帮”的干预，运动半途而废。

既然要继续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质和用途问题。许世友又提出两点疑问：

第一，1971年5月，军区成立了师级招待处，为什么林彪一死，当年12月底招待处就匆忙解散了？说明刘兴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处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为什么要将广州至从化的公路改线，而且在新选的线路上开了一条可供隐藏飞机的隧道，还计划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飞机的路面，是否是为林彪准备的政变工程？

关于招待处的成立与撤销，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广州至从化公路改线工程，最早的倡议者是刘如。广州至从化公路约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时新辟的一段通往从化的公路称为广从公路改线工程，其实并不确切，刘如建议修建的不过是从广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长约10公里的迂回路。据刘如说，他在受领组织修建南湖工程任务之后，感到这里紧靠广（州）从（化）公路，而且这条路汽车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议，在原有公路以东，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筑一条避开南湖通往从化的迂回路。军区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计划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约1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刘如考虑，如果修盘山路，弯多坡陡，行车不畅，而且从山顶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议：干脆打隧道，虽然工程量和难度大些，也要多花点钱，但从长远看，好处很多。刘如是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每进行一项基本建设，他都要考虑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觉得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战时需要考虑进去，做到平战结合。他看到，这条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较开阔，于是建议选择一段路面拓宽加固，可作为战时飞机迫降的简易跑道；再将隧道加高加宽，迫降的飞机可进入隧道隐蔽，也可作为汽车的防空洞。他这两条意见也被军区领导采纳。刘如随即根据刘兴元的指示，请广州市革委会负责施工，军区工程兵给予技术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飞机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军，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根据军区指示到现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顾同舟被定为林彪死党，这便使事情复杂化了。

刘如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条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条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说这项工程是为林彪武装政变准备的，在时间上就无法解释。刘如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南湖工程刚开工时，林彪还是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他和毛泽东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再说，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一条短短的隧道在战略上有啥作用？

刘如的一切陈述都被斥为狡辩。至于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对南湖几组房子修建来历情况的说明，非但全然无用，而且被认定是“为林贼开脱罪责”。唯一出路只能是老实“认罪”，起码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路线觉悟不高，上当受骗，帮坏人干了坏事，接受“群众”批判，听候组织处理。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间，几位参与其事受批斗者，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材料、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来历的负责人出来说明情况，这种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尤盼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发。

◇ 未了的尾声

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革命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

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者始终弄不明白：这项工程从筹划到完工，过程清清楚楚，而且

军区领导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来和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住过，都对房子的周围环境和房子的设计、施工大加赞赏，这些房子的来历和用途一清二楚，为什么竟没有一人出来为它正名，说句公道话，不惜让一些人长期蒙冤受屈？

2007年10月3日初稿于广州

2009年4月25日定稿

□ 原载《往事》第八十四期

~~~~~

【往事如烟】

## 北大“文革”二三事

• 郑克中 •

看到小报上有一篇《文革一号“造反派”聂元梓今昔》的文章，不禁勾起了我对三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我和聂元梓并没有直接交往过，原因一是地位不同，她那时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二是当时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但我们确实有过交道，要不是因为她，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的，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当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之时，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不了解大字报的背景和内幕，仅从内容判断，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的。我们认为这是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矛盾扩大化、政治化，以求将对方打倒，这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常用的手段。斗争哲学嘛，就是斗，你不斗别人，别人也要斗你，要不怎能升迁和出人头地呢？但对聂等人采取的扩大事态、上纲上线的做法，我们难以理解。因此对他们的人品有些怀疑，甚至是反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贴出，反击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校园，人们的判断是：反对陆平就是反北大校党委，反北大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右派。接着有传言说，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是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地方。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几个人决定也写一张，并于26日晚贴到了学三食堂里的墙上，题目是“质问聂元梓们：想干什么？”没想到6月1日晚，风云突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其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聂元梓的来头一定不小。回过神之后，我们忽然想到学三食堂还贴有我们“围攻”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赶紧去撕。没想到看守大字报的校友高低不让我们撕，好说歹说，在确信是我们几个人所写之后，他才勉强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整个校园几乎就没有了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了。我们这些“保皇派”（保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造反派”（拥聂）。后来武斗、打派仗时，许多人津津乐道自己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甚为幼稚可笑。其实，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聂元梓是何许人也？即使知道，也不过是一场赌博罢了。过了一段时间，七位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名的人互争“贡献”大小，又传出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是别人写完后，她在大字报最后面添了两句口号。因为她官最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乱了套，课也不能上了，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等，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女）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大白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

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头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层高的台阶上踢下去……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竟遭此奇耻大辱。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匆匆回到宿舍，恶心得晚饭都难以下咽。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从此以后，我对所谓的运动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当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1日选举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取代了陆平。接着各系也纷纷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领导。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这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他已被打倒，全家和他一起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发的。他告诉我，如果能在北大呆下去就呆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生存的办法吧。这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子就被击得浑身瘫软，站不起来了。我呆呆地望着宿舍的墙壁，泪水涌上眼眶，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据北大的现状，我能猜出父亲的遭遇。但不管怎么样，还得把家里的事向组织汇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岑万洪，他是俄语系文革会成员，这完全是因为他出身好，而他本人是一个善良得要命的人。他安慰我别着急，说他向系里汇报后就去找聂元梓。果然，大约只过了几天的样子，岑就告诉我，聂元梓已经批了，每月给我十七块五的助学金，并转告我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北大助学金的最高标准是十九块五，只有真正来自农村、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才能享受，我能领到十七块五的助学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这事发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想聂元梓可能早已忘记了。但她作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却决定了我的命运。

就凭着这每月十七块五毛钱，我在北大坚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块五的伙食费，还剩两块钱零用。后来学校规定，节余的饭票可以换钱，这样我有时就不吃早饭或晚饭，每月还可再省出四五元钱买点生活必需品。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被押送回乡之后，乡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聂元梓，要求把我也弄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说我是富农家的狗崽子，这样的人怎能在北大读书？他们的要求被聂元梓拒绝了。聂说，家庭和本人是两回事，只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几年，我都老老实实呆在学校里，没敢回一次家。我知道，回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故乡对我是一个遥远的梦，我爱她的青山绿水，那是我的祖先耕耘和安息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要是没有人不断地输送仇恨和争斗，而是输送文明和科学，那里该是像奥地利、瑞士一样美丽的地方！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8月19日聂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后来有一些人反对聂元梓，北大红卫兵出现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个组织。这样北大就出现了两派，开始了武斗，开了全国武斗之先河。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校园里的大喇叭忽然传出聂元梓的命令，说从清华大学附中过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来北大“破四旧”，喇叭里号召北大红卫兵紧急奔赴校西门，去保卫西门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我们紧急出动，手拉手把华表围了起来，在那里整整坚守了一下午。后来听说，那批红卫兵见北大人多势众，没有敢来砸。北大西门院里的那对华表与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一样的，是北京仅有的两对华表，无比珍贵。清华大学门前的石牌坊和狮子就是在那时被砸毁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迹文物那时罕有能逃过这一劫的。记得我曾到颐和园去过，在排云殿东侧，看到被砸毁的铜像，一片狼藉，目不忍睹。“文革”中红卫兵挺身护“四旧”，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断发生。许多人被隔离审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俄语系朱耆泉老师就被关在我们住的那一层楼，一天清晨就听到窗外“咚”地一声闷响，然后就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我打开窗户向下一看，只见楼底下蜷缩着一个人，腿还在抽搐着，鼻孔和嘴流出了血。朱老师是南方人，却长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语，在没关到我们楼之前我不认识他。后来知道除了出身是资本家，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俄语系遭遇最惨的是田宝琪教授，他当过民国政府驻阿富汗使馆文化参赞，1949年拒绝去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了大陆。“文革”开始没多久他就被隔离了，一天早晨他被专案组叫醒：他的爱人、弟弟、弟媳都死了。爱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田先生呆站在那里，嗫嚅着：“他们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限……”

大约是1968年8月中旬，听说邓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从42号楼五楼跳下去的，这座楼在我们住的40号楼的右边。我想他走这一步，肯定是出于无奈。十多天后的一天晚上，岑万洪对我说：“邓朴方摔伤躺在医院里没人管，校革委会让各系轮流去照看，每个系两天，咱们系没有人愿意去，要不明天咱们两个人去吧。”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人来到北医三院，在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他。因为医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搁到了走廊里。虽然同在一个学校，我对他也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尽管脸色苍白，连鬓胡子长得挺长，但浓眉大眼，透露出一股英气。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不说一句话。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护士交代我们，每隔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疮，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出乎意料，他没有拒绝。谈话中我们得知，医院没给他做手术，也没进行任何治疗，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他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没人去看他，被关起来之后，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我完全理解，人一旦陷入绝境，要是有人对他说几句安慰开导的话，哪怕是几句，也会唤起他的生的希望，然而却没有！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医院撵他出去，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听得出，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多年后我才从报刊杂志上知道，他从医院出来先被接回北大校医院，后来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许许多多苦。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时，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台柱子”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他的自杀叫许多人背地里唏嘘了一阵子。他曾在苏联留学八年，学过许多不同专业，业务水平很高，但个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向我讲过龚先生的一件逸事。说有一年夏天，烈日当空，气温非常高，龚先生给学生上课却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挥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细，课后尾随其至住所，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龚先生穿衣常用“比较法”，衣服穿过往床底一塞，经常忘记洗，需要时再拿出来比较一下，哪一件稍干净就继续穿。那天比来比去，实在没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课。此后同学们就经常去给他洗洗衣服。凡听过龚先生课的同学都知道，听龚先生的课不仅是学知识，更是一种语言文学美的享受。他爱摆弄收音机，和一些朋友聚会常唱苏联歌曲，因此被怀疑在搞裴多菲俱乐部，是苏修特务。隔离审查时，他躺在教学一楼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晚上用夹在《毛选》里的刮胡刀片割断了颈动脉。看管他的人背对着他打盹，等发现脚下出现一滩血迹时，龚先生已经断气了。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近30年，今天的中年人，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已经淡漠，更不用说青年人了。但我而言，回忆仍然是痛苦的。现在看来，聂元梓不过是那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假如没有聂元梓，还会不会出来什么张元梓、李元梓呢？

~~~~~  
【难忘岁月】

文革纪实——恐怖的清查“五一六”

• 金 渝 •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S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S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

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S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S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零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S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S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S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

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